

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

陳博生先生講

敵情研究

二十八年三月印



目 錄

- (一) 日本政治演變的三大時期
- (二) 日本政治制度的三大弱點
- (三) 日本左右兩派的特徵及發展
- (四) 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的衰落
- (五) 日本經濟的脆弱性
- (六) 日本戰時經濟的體制
- (七) 日本戰費來源的窮困
- (八) 日本國民負擔力的薄弱
- (九) 通貨膨脹的惡性化
- (十) 農村問題與農民的貧困
- (十一) 日本社會的奇怪現象

戰情研究 目錄

MG
D731.30
50



3 1764 8862 9

藏書研究 目錄

敵情研究

(一)日本政治演變的三大時期

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，政治的演變，可分三大時期。第一期自明治二十二年（一八八九）二月二十一日公佈憲法起，至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九月止，二十九年間，可謂爲藩閥官僚及軍人互相授受政權時期。第二期自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九月廿九日政友會原敬內閣成立起，至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五月大齋藤實內閣瓦解止，約十四年間，是政黨全盛時期。自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五月二十六日齋藤實內閣成立起，至現在止，可謂爲漸進的右派軍人全盛時期。日本內閣制度成立於憲法公佈之前，當時正是維新的初期，所以於明治十八年（一八八五）十二月第一次內閣成立時，第一任總理大臣，便是伊藤博文，他的關員，都是當時參與維新的大人物。那時候，民權論當然很盛，明治十四年（一八八一）日本政黨的开始——自由黨已經成立了，自由黨是板垣退助所組織的，即政友會的前身。明治十五年（一八八二）改進黨組織成功，大隈重信是一個領袖，可以說是民權黨的前身。但是民衆



(南)

的力量，尙未能結成一種勢力，可以與藩閥及軍人對抗，所以在第一期二十九年之中，組織的人物，只有伊藤博文，黑田清隆，山縣有朋，西園寺公望，桂太郎，寺內正毅等幾個人。在這時期內，政黨業已萌芽，例如西園寺公望，大隈重信，桂太郎等組閣，雖不無多少政黨的基礎，但政黨是寄生的狀態，並不能取得主動的地位，這是值得注目的。政黨在寄生狀態之下，利用社會的環境，與教育的進步，漸漸培養了獨立主動的勢力，所以在第一期中，已種下政黨政治必然實現的種子。當時政黨的奮鬥，也非常猛烈，強化黨的組織，擴大黨的地盤，收羅社會上的人才，吸收資本家的力量，所以在二十一年以前，即一九一八年，純粹的政黨內閣，首由政友會總裁原敬組織成功了。原敬在任不過三年，被人暗殺了，但因政黨在民衆中，已經有了很鞏固的基礎，而且領袖的人物，都是有聲望有材幹的，所以第一次政黨內閣雖然受了重大的打擊，而依然可以支持下去，這在日本政治鬥爭史上，是很有意思的。自原內閣起，十四年間，完全是政友會與民政黨更番組閣的時期。其中大正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因爲遭遇了空前的大地震，山本權兵衛（海軍領袖）的混合內閣乘機出現，只維持了四個月，便瓦解了。繼起的是自命爲超然內閣的清浦奎吾（是重臣

之一，現已退隱了）內閣，其實是純粹的官僚內閣，各黨當然反對。當時最有力的三黨——政友會，憲政會（即民政黨的前身），革新俱樂部，為爭取政黨的地位聯合不信任清浦內閣，議會解散，改選結果，三黨佔絕對大多數，清浦內閣辭職，由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組織三黨聯合內閣，這是大正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六月間的事。自是以後，直到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五月，總理大臣犬養毅被刺，時勢大變，右派軍人認既成政黨為國家罪人，非推翻政黨政治不可，時局急轉直下，元老重臣徬徨無措，一方固不敢接受右派軍人的主張，一方亦不敢維持政黨內閣的常軌，乃推薦海軍元老齋藤實組閣，希望可以收拾時局。政黨內閣至此，正像患了急病的兒童，剛剛十四歲，尚未成年，便夭折了。齋藤是一位平穩無疵的老軍人，在海軍部內，雖有資望與勢力，但是少壯軍人對他是不滿意的。稍明內幕的人們，都痛切認識，這種辦法，是不能持久的，更不能收拾難局的。齋藤內閣支持不到兩年，便讓給他後輩岡田啟介組閣了。岡田內閣本是齋藤內閣的延長，齋藤毫無成就而去，岡田在這嚴重局勢之下，更是拱手無為，從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七月，維持到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二月，釀成日本歷史上空前大事件的「二二六事變」，廣田弘毅得了

近衛文麿的推薦，負起收拾空前變故的大責任，組織內閣。中間又經過了林銑十郎與近衛文麿兩內閣，才到現在的平沼騏一郎內閣，這些漸進的右派軍人全盛時期。

(二)日本政治制度的三大弱點

我們從用治制定憲法以來，到現在的五十年間，檢討日本政治演變的過程，可以知道他們立憲政治所以未能成功的原因，有三。第一個弱點，日本憲法是由上而下的，所以憲法的規定，對於民權的發展，有很多的限制，例如議會的最大權力，是預算審議權，與不信任內閣權。而日本衆議院預算審議權是與貴族院相等的，貴族院是官僚的巢窟，貴族院可以牽制衆議院的行動，並且衆議院對於內閣，沒有不信任投票權。假使衆議院彈劾內閣，內閣可以解散衆議院的。日本人民迷信官權非常厲害。從日本選舉史看來，過去二十次總選舉結果，除了大正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清浦超然內閣以外，沒有一次不是政府黨勝利的。在實行議會政治的初期，政府公然干涉選舉，惹起政潮，是「司空見慣」的醜事。至今賄賂，干涉的弊害，仍時有所聞。所以他們雖然經過了五十年的訓練，憲政還是一個虛名，釀成今天這種局面。第二個弱點，日本內閣官制上，規定陸海軍大臣必須由陸海軍

現役大中將充任，這是政黨政治的致命傷，因為現役軍人是不許加入政黨的。當時立法的意思，就是軍人要永遠取得政治的支配權，特別想出這一條規定，來阻止政黨政治的發展。可見明治維新時，建軍元祖山縣有朋的陰謀狡計。在大正初葉，政黨政治家，如犬養毅，尾崎行雄，原敬一流人物，極力設法取消這一條，主張文人也可以充任陸海軍大臣。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，於昭和初年，才改為豫備役的陸海大中將，也可以充任陸海軍大臣。但是到了廣田內閣，又恢復原狀，依然是非現役不可的了。所以無論任何人組織內閣，陸海軍方面必提出條件，來相挾制，以謀貫徹他們的主張。組閣者如不接受他們的條件，就組織不成功。因陸海軍內部的慣例，新任的陸軍大臣候補者，是由陸軍三長官推薦的，所謂三長官即是陸軍參謀總長，陸軍教育總監，陸軍大臣，他們是三位一體的，代表整個陸軍的意見與態度。新任海軍大臣的候補者，是由海軍軍令部總長與海軍大臣推薦的。陸海軍大臣不是由組閣的總理大臣，可以自由從現役軍人中選任的。有了這層層的束縛，所以陸海軍就取得了內閣的制命權，這是日本軍人支配政治的最大武器。第二個弱點，是陸海軍的權樞上奏權。日本把陸海軍的編制、指揮、軍政，全劃在普通國務以外，所以內閣

對於陸海軍事項，絲毫沒有過問的權力，除了陸海軍預算以外，任何事項都不經過閣議。陸海軍大臣，陸軍參謀總長，海軍軍令部總長都有直接上奏權，即所謂帷幄上奏權，所以內閣對於陸海軍事項，即有意見，非得陸海軍當局的同意，便不能貫徹，因為陸海軍當局可以單獨上奏，一經裁可，內閣也無法補救了。關於帷幄上奏權，雖限定於有閣統帥權事項，但事實上陸海軍當局往往濫用這特權，並且無法糾正，所以帷幄上奏權，在政治上作用甚大，又成爲軍人干涉政治的一大武器。

上述三端，是日本憲政上最大的弱點，演成今日軍人支配政權的局勢。五十年來，政黨政治家所努力爭取的政黨政治，恐怕在最近二三十年內，不但沒有實現的可能性，而且尚有相反的方向急進的趨勢，這是日本政治的悲哀！

(三)日本左右兩派的特徵及發展

思想與政治，有密切的關係，是無待贅言的。日本在明治初期，因為憂時之士目擊幕府專政，天皇成了傀儡，所以尊皇論風行一時，差不多成了不尊皇便不愛國的風氣。到了明治中葉和末葉，由歐美各國畢業歸來的青年漸多，而且佔了很重要的地位，於是民權論

又繼尊皇論而起，風靡一世，尤其在我國革命成功以後，蘇聯革命成功，歐戰結束的時後，民主思想，更爲青年所心醉。我們如果翻閱當時日本所出版的刊物，就可以發見每期都有這一類的討論，各大學中研究社會科學的青年，比任何學科都多。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政黨內閣所以能成功，也是受這時代潮流的影響。不但在政治上表現了若干較近民主政治的措施（如普通選舉等），即在社會運動上，也樹立了相當基礎。左傾團體的存在，雖然不能獲得政府的許可，而藉各種學會或其他名義作掩護的左派團體，非常之多。左派在思想上，下了很普遍很有效的種子，所以，現在法西斯思想雖極猖獗，他們受了沉重的壓迫，依然有很堅強的努力，這是最可注目的。左派活動最盛時期，是從大正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到大正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六年間，時間雖不長，根基很深入，至今衆議院中尙有一位碩果僅存的左派議員（加藤勘十），可見他們的潛勢力，是不可輕視的。現在在勞動運動中，屬於左派系統的，有全國勞農協議會，加入的勞動團體很多，但是他們受官權的壓迫，非常厲害，自中日戰爭發生以後，當然更不能公開活動。當左派最活躍時期，他們的意見，參差不一，陣營內戰線，並未統一。有的主張英美式民主政治，有的主張社會民主主

義，有的主張共產主義，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。但從日本政府幾度大規模壓迫之後，有的轉變了，有的屈服了，所以現在所遺留下來的左派秘密團體，大概都是傾向於蘇聯路線的。最近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左傾風潮，轟動一時，也是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連累，值得注意。因為日本軍權高於一切的時代，左派的公開活動，自然是不為政府所允許的，但他們在社會各方面潛行的反軍閥，反戰爭的活動，是很活潑的。他們活動力量，是隨着民衆生活困難，而繼長增高的。一旦時機成熟，有突然爆發的可能性。

日本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國家，一國之內派別分歧本來不是一件意外事，但日本對抗左派的右派團體，非常奇怪，屬於神祕的佔大多數。這或許是日本民族性迷信神權的結果。當左派全盛時，右派的結合，已經開始了。右派的陣營，亦異常複雜，大別之，可分急進的右派與漸進的右派。急進的右派雖然有許多派別，但他們有個共通之點，即主張「天皇親政」。他們以為在現行制度之下。天皇的大權旁落了，所有一切國務，皆由內閣負責，而產生內閣的實權，又在幾個元老重臣的掌中，天皇不過虛有其名而已。在元老重臣的背後，操縱政權的，又是幾個大財閥，所以要廓清政治，必須推翻資本家與資本制度，

掃蕩元老重臣以及既成政黨，始能建立真正「一君萬民」的政治。他們的主張之中，如「產業奉還論」，「政權奉還論」是最具體的。「產業奉還論」即將全國所有的私人產業，皆應奉還國家。「政權奉還論」即將政權奉還天皇。他們以為要貫徹這種信念非採用革命手段不可。所以自昭和三年（一九二七——二八）起，實行革命手段的第一步，便是採取暗殺行動。昭和五年（一九三〇）當時總理大臣濱口雄幸（民政黨總裁）被刺，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前財政大臣井上準之助，三井公司總經理團琢磨的被害，以及轟動一世的五一五事件，總理大臣犬養毅在官邸遇害，連續而生，一直到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二二六事變發生，叛兵殺害了許多重臣，都是一個系統，一個線索的。他們以為暗殺可以喚起元老重臣資本家以及既成政黨的反省，但是，依然不能發生很大的效果，所以才潛入軍隊，實現革命的行動。然而二二六事變失敗以後，反右派的議論瀰漫全國，而元老重臣資本家以及既成政黨雖痛切感覺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，皆有「改弦易轍」的必要，但對於右派的革命行動，當然也認為非澈底肅清不可的，所以於事變鎮定之後，政黨內閣雖因此消滅，而「肅軍」亦成爲極嚴重的問題。右派受了這次悲慘的教訓之後，也知道採取革命行

動，是毫無把握的，於是改變方針，由合法途徑，以圖改造政治。所以最近四年來，他們從事民衆運動，企圖組織政黨，爭取政權，現時他們所成立的政治團體，缺乏組織，並且沒有統一的領袖，和民衆的地盤，前途尙屬遼遠。既成政黨之中，東方會與右派甚爲接近，如果將來右派的大聯合組織萬一可以成功，則東方會也許可以成一個中堅的團體。

日本右派團體，雖然多屬於神祕的性質，但他們因爲可以吸收許多壯軍人，故在軍部中，獲得了中堅的勢力，利用這種力量，決定全軍的主張，由陸海軍大臣，以國務大臣的資格，干與國政。急進的右派失敗之後，現時最佔勢力的，便是漸進的右派。這派以爲急進的方法，必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對，阻礙甚多，不如漸進，較有把握，所以自二二六事件（一九三六）以後四年間，他們是依着這種方針，努力貫徹他們的主張。五一五事件（一九三二）以後的齋藤，岡田，廣田，林四內閣，都是敷衍局面，並沒有切實執行這一派的主張，所以急進派固然不平，漸進派也認爲希望甚少。近衛內閣，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應運而生。近衛內閣成立僅僅一個月，他們就發動了蘆溝橋事變，促進他們對外侵略對內改革的大計劃。在近衛內閣十九個月任內，他們完成了「戰時體制」的改造，在政治及經濟

方面，實現了許多統制辦法，使日本在事實上，向着法西斯的路線前進。所以急進的右派在形式上，雖然沒有成功，在實質上，他們的主張在相當程度內已經貫徹了。但右派尚未滿意，他們以爲在政治制度方面尚有許多重要問題，未曾改造，沒有達到「庶政一新」的目的。如貴族院制度改革問題，衆議院選舉法修改問題，既成政黨改造問題，是急進的與漸進的右派所共同主張的。近衛內閣任中，雖然設立了兩個調查委員會，但至今尙無具體方案。平沼內閣成立後，對於這些問題，亦無一言提及，所以右派對於現狀，認爲仍未能達到其所期望的程度，非組織強有力內閣不可，這是敵人國內所潛伏的政治危機。右派所以能取得支配政治的力量，軍人佔多數，固爲最重要的原因，但是官僚厭惡政黨的結果，依附右派軍人，希圖操縱政治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。日本政治上，官僚的勢力，不可輕視，官僚可以左右元老重臣，同時又可以在右派黑幕中活動。當初右派專與資本家爲難，後來資本家也知道這種潮流是不易對抗的，有一部分資本家也投在漸進的右派陣營去，要在內部，糾正他們的主張，所以漸進右派活動的資金，有出自資本家的。這幾年漸進的右派與資本家比較接近，原因在此。

就現在日本政治的趨勢而言，向着右邊走，是毫無疑義的，雖然有元老重臣，既成政黨，一部分資本家，以及社會智識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的幾種力量，牽制着，不許急速向極右狂奔，但是，這幾種力量，只能在某種程度內，使其慢走，絕不能使其不向右走，更不能使其向後走。當前日本政局，尙是幾種相反的勢力，互相牽制着，漸進的右派力量，比其他力量大，所以一步步向右走。我們的觀察，以爲日本在不久將來，有產生純粹右派的內閣的必然性。在這內閣之下，完成一大部分右派的主張，因此引起國內反右派的反抗，釀成政治上的大門爭。

(四)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的衰落

我們對於日本政治的動向，最後不能不提及元老重臣與既成政黨。日本所謂元老，在憲法上並無根據，明治末葉，因維新功臣甚多，尤以伊藤博文、山縣有朋、井上馨，松方正義這幾位老臣，都是對於國家有特殊勤勞的，所以遇着國家大事，必徵求他們的意見，然後決定辦法。尤其內閣變動時，對於相關人選，一定要這幾位推薦的，所以元老變成了內閣的製造者。大正繼位，當然遵循遺規，益加重視元老，以後又加入大隈重信，西園寺

公望兩人。這一般老臣相繼物故，現時只剩西園寺一人了。西園寺是快到九十歲的老翁，自知前途有限，而又感覺當政變發生時，非有元老重臣陳述意見，則一切難題，或不易立決，所以於五一五事件時，特創立新例，推薦組閣人選，不取決於元老一人，由所謂重臣階級人物，共同討論，以最後意見，轉陳日皇。所謂重臣，並無法定資格，大體上限定於內大臣（即掌璽大臣），宮內大臣，樞密院議長，以及曾經累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人物。但急進的右派本來反對元老重臣，累次暗殺的對象，都集中在這一團人物。元老如能早日消滅，當然是他們的願望，現在於元老垂盡的時候，又創設甚麼「重臣會議」替代變相的元老，自然更加反對。同時漸進的右派，既成政黨也不以為然，即自由主義者，根本上也不贊成，國內輿論可謂一致反對。二二六事件以後，西園寺更不敢採取這種重臣會議的方式，所以現在在形式上依然由西園寺一人決定，而事實上，則西園寺於決定之前，暗中徵求內大臣和樞密院議長的意見以作參考。一旦西園寺死後，元老自然消滅，在無形中，繼承元老的人物將來大概屬於湯淺凡平，近衛文麿兩人。現任宮內大臣松平恆雄因為特殊關係，也許可以參加。元老的存在，是日本政治民主化的障礙物，同時又是法西化的制動機。

日本既成政黨，現時比較有力的，只有三黨。第一是民政黨，第二是政友會，第三是社會大眾黨。民政黨與政友會歷史甚久，從明治初葉的改進黨與自由黨演變而來的。當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到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是兩黨更代組閣的時期，是政黨的黃金時代。當時兩黨的領袖以及幹部，的確都是優秀的人物，如民政黨的加藤高明，若槻禮次郎，濱口雄幸，井上準之助等，政友會的原敬，高橋是清，床次竹二郎，犬養毅都是一代的門將，所以民衆對於政黨有相當信仰。一般社會對於黨弊，抨擊雖然很厲害，但是政黨所苦心經營的地盤，始終沒有動搖。原敬，濱口雄幸，犬養毅，高橋是清，相繼遇害，加藤高明，床次竹二郎先後物故之後，兩大政黨，就剩下一個軀殼，所以遭遇五一五事件（一九三二），便無法挽回頹勢了。最近七年間，既成兩大政黨，完全在軍閥官僚支配之下，仰人鼻息，希圖苟存而已。在近衛內閣末期，因為「國民再組織」問題，引起了重大糾紛。所謂「國民再組織」，涵義固多，而改組既成政黨，實為最主要因素。改組既成政黨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將既成政黨變成法西斯黨，這是兩黨所一致反對的。現時既成政黨雖然微弱無力，而遇到危及他們生存的問題，當然要反抗的，近衛不敢在這重大時機，引起這樣嚴重

糾紛，即形式上舉國一致，也不維持，所以辭職而去。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既成政黨與新興右派勢力，有不能調解的癥結，遲早總要爆發的。從現在政黨的實力看來，似乎一定要失敗的，但從另一方面看，又似乎尚不能即下斷語。關鍵全在兩黨有無決心與勇氣，及黨內團結力的強弱。因為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總選舉的結果，選舉有權者的總數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八人之中，約有九百萬人，是屬於兩大政黨的，約佔日本全人口八分之一，估選舉有權者總數百分之七十，當然是很有力量的。兩大政黨如能運用這民衆力量來實行鬥爭，勝敗正未可知。可惜既成政黨的鬥志，比以前差得多了，並且缺乏領袖的人物，不能統一全黨的意志，向右派陣營衝鋒，只得觀望時機，苟延壽命。民政黨在町田忠治領導之下，團結力尙形鞏固，但內部仍有問題。政友會從鈴木喜一郎辭退總裁之後，因各派對立，至今尙沿用代行委員制，替代總裁制，黨內的傾軋，最爲劇烈。既成政黨長此因循，各黨內部必然要發生分化的。

至於社會大衆黨，從前在日本衆議院中，可說是比較向左的唯一的合法政黨，但是他們所信奉的是國家資本主義，並且其中一部分黨員與軍閥早有相當聯絡，所以於昭和十二

年（一九三七）十一月十五日該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時，將以前擁護工農勤勞大衆的生活，及打破資本主義，以解放無產階級的黨綱，完全放棄了，而主張「根據日本國體的本義，謀日本國民的進步和發達，改革資本主義，以求產業的計劃化和國民生活的安定」了，從階級意識，而變爲國民意識，從反資本主義，而變爲擁護資本主義。這可謂爲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所以最近該黨有與衆議院中最右派的東方會合併，但是尙有相當阻礙，一時不能成功。

總之日本既成政黨有許多內在的弱點。並且任何黨派都有一部分黨員傾向於漸進的右派的，所以無法向右派進攻，同時各黨又互相猜忌，不能樹立一個聯合戰線，爲政黨政治奮鬥，這是日本在現階段政局中，最可注目的一个局勢。最後要補充說明的，就是政友會是以地主及金融資本家爲基礎的，所以對華政策，注重華北，並且要取得許多利權，作爲投機的根據地。民政黨是以商工業者爲基礎的，所以對華政策，注重華中及華南，目的只求推銷生產品。這是大體上區別，可以作爲我們參考的。

（五）日本經濟的脆弱性

日本國民經濟是建立在農業與輕工業上面，並且是在自由競爭主義的資本制度下發達起來的，日本是缺乏原料的國家，國防上所需要的鐵，羊毛，棉花，煤油等等，都是依賴外國供給的。所以日本雖然擁有相當的海陸軍，而從經濟上看來，尙不能謂為獨立的國家。日本每年礦物生產的總額，約在五萬萬八千九百萬日元左右，而輸入的總額，約六萬萬三千七百萬元，合共十二萬萬二千六百萬元，其中輸出的不過一萬萬三千二百萬元，所以日本每年所需要的礦物，只有一半是國內生產的，其餘一半，要靠外國供給的。例如鐵的需要量，每年約四百四十五萬二千噸，而他們國內的生產量，只有六十七萬三千噸，不過六分之一。煤油需要量每年約六千六百八十七萬箱，而國內生產量，只有五百三十一萬八千箱，不及十分之一。棉花，羊毛等於沒有。九一八事變以後，他們痛感國防工業原料的缺乏，於是極力設法實現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，建立重工業的基礎。

日本國民經濟上，有一極大的缺陷，即對外貿易繼續入超，已達二十年之久，日本輸出品之中，以棉織物，絲織物，人進絲織物，食料品，人造絲等為最多。輸入品之中，當然以原料為最多，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七十。這樣入超連續的國家，當然要引起一個最嚴重

的問題，便是黃金出口。日本國內每年產金量甚少，據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統計，不過三千八百一十六萬日元，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四千五百五十八萬五千日元，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五千四百六十九萬二千日元（以上包括朝鮮台灣在內），昭和十二年以後，因為戰爭關係，並無數字發表。自從中日開戰以後，日本對外貿易，入超更多。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入超，是六萬萬日元左右。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是四萬萬九千萬日元。所以增加金的產量，是日本所苦心焦慮的，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八月制定「產金法」，極力保護獎勵產金事業，以五年計劃，達到每年能生產二萬萬日元的黃金。據今年他們財政大臣在議會的報告，知道去年金的產量，遠在預定計劃之下，成績甚劣，可是確實的數字，祕不發表。

日本現在究竟尚有若干黃金，這是很重大問題，而至今尚未得確實數字。在開戰以前，日本銀行所存現金準備，共五萬萬二千四百萬日元，是以純金七百五十公絲（即一千公分之〇・七五〇）作一日元計算的。但是當時金的市價，比這法定的價格高兩倍以上，所以於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八月變更評價，以純金二百九十公絲作一日元計算。日本銀

行的金準備五萬萬二千四百萬日元，一變而為十四萬萬一千餘萬日元，其中八萬萬日元仍留日本銀行作現金準備，其餘六萬萬二千餘萬日元，撥作特別資金，充作償付國際債務之用。在過去十幾個月中，日本所用以購買外國軍火軍需原料，以及償付國際債務的現金，除了這一筆六萬萬現金之外，尚有原存外國的現金，約一萬七八千萬日元，新生產的金一萬萬日元左右，收買民間存金約三四千萬日元，及各大公司存在外國的現金，約六七千萬日元，以及公私所有的外國債券股票。昨年因為這些現金尚不足用，又從日本銀行所存八萬萬現金準備之中，提出三萬萬日元，作為償付入超的基金。從表面上看來，日本銀行尚有現金五萬萬日元，但暗中是否已經提用，尚不可知。據外國專家推測，恐怕這五萬萬日元的現金，也是有名無實，早已盜用了，所以「金」的問題，是敵人最大的苦惱。

「金」是戰爭的要素之一，世界的戰術大家克勞維茲曾經說過：「戰爭第一是錢，第二是錢，第三是錢」，尤其現代作戰，經濟戰是最重要的。我們要檢討敵人經濟力，方面很多，而由敵人特殊國情看來，「金」的問題，是一個中心。敵已有的金，已經快用盡了。我們估計，即在敵人現時極端統制輸入及管理外匯的辦法之下，而每年入超，至少不能

在四萬萬日元以下。每年新生產的金，是有限的，至多不能超過兩萬萬日元，今年雖然開始強迫民間交出金器金首飾等，但是日本民間所存的金，是微乎其微。向外國借款，在當前國際環境之下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們佔領了許多我們的都市，極力想推銷仇貨，但是他們所取得的，全是日元鈔票或是變相的日元鈔票，不能因此取得外幣，增強外匯，所以這一點是觀察與判斷今後敵人的戰鬥力，最重要的因素，敵人經濟力的脆弱性，可以充分看出來了。

(六)日本戰時的經濟體制

敵人癡感他們經濟的脆弱性，所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右派軍人力倡從速完成「準戰時體制」，這當然包括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制度在內。歷年政治上的摩擦與鬥爭，皆由此而來。政治上的改革，始終沒有成就，原因何在，前面已經說過了。經濟上的改造，自七七事變以後，才一氣呵成，實現了「戰時經濟體制」，這是時勢所造成的，雖然有一部分人仍認這種體制，尚未澈底，但從敵人經濟史看來，可謂為空前的改革。第一是「資金調整法」。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九月公佈的。這是實行經濟統制的第一步，將全國的實業

，分爲三種。金融機關對於各種實業的放款或投資，超過十萬日元以上，必須先得主管大臣的許可。凡與軍需工業有直接關係，或有密切關係的實業，爲甲種；凡與軍需工業有間接關係，或爲國民生活所必需的實業，爲乙種；此外皆爲丙種，如印刷業，保險業，金融業等是。屬於甲種的，當然許可，屬於乙種的，經嚴格審查後，大體也許可，只有丙種，以不許可爲原則。這個立法的意思，是儘量將資本集中，促進軍需工業的發達，同時將擴張或創辦戰時所不必要的實業的資金，集中購買公債。第二是「臨時輸出入措置法」，也是昭和十二年九月公布的。因爲日本是入超的國家，同時又是缺乏黃金的國家，爲謀國際收支平衡計，尤其在戰時，更不能不求外匯的穩定，極力設法減少輸入。根據這個法令，將外國貿易品，分爲三類，甲類是在敵人國防工業上所不可缺少的，在國防工業所需要的程度內，允許輸入。如棉花、羊毛、木料之類是。乙類是與國防工業無關，而且是國民生活上不必要的商品，一律全部禁止入口，約有三百餘種之多。丙類是日本的國產品，因國防關係，禁止出口的。這兩個法令是樹立「戰時經濟體制」的基礎。

後來因爲戰局日益擴大，僅賴這兩種法令，尙不足以適應戰時的需要，必須有更大規

模的物資動員。敵人的物力，財力，人力本來是有限的，尤其財物兩力，更覺缺乏，非實行全國總動員，不能支撐。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二月十九日，由內閣擬定「國家總動員法」草案提交議會審議。經貴衆兩院通過後，於同年五月三日公布，自五月五日實行。國家總動員法內容，共五十條，從人力，物力，財力三方面，規定在戰時如何配合國家作戰的需要，發動力量，在平時應如何培養這三種力量，作戰時的準備。政府可以根據這動員法的規定，制定特種法令，實現其中某一項動員的具體辦法。所以國家總動員法雖然公布了，但是每一項的條文，都有了實施的詳細辦法，才算是實行了。當制定國家總動員法時，資本家很反對，因為與他們本身利益有害，尤其該法第十一條中，限制各公司分紅，及強迫貸款的規定，資本家認爲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辦法，不願接受。因此國內發生了許多摩擦，幾乎要釀成大風潮。昨年近衛內閣末期，經過了許多磋商，才擬定折衷辦法，決定實施這兩項的規定。限制分紅的辦法，是資本在二十萬日元以上的公司。（一）凡現在分紅已在一分以上的，仍舊分配，如欲增加時，必須得財政大臣的許可。（二）凡現在分紅在一分以下，六厘以上的，每年得增加二厘。（三）凡現在分紅未滿六厘的，得自由

增加至六厘。這比較是緩和得多了，若照右派的主張，則必須以一分爲最大限度，不得超過一分。自從戰爭開始以來，敵人的工業，演成跛行狀態，軍需工業非常發達，分紅非常多。而平和工業是正比例的萎縮了。國內對於軍需工業者，非常側目，不但在戰費負擔上，發生了不均衡的狀態，而且乘着戰爭的機會，軍需工業者及關係者發了不義之財，非加限制，不足以昭公允，發動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主要作用在此。因爲國家總動員法各項規定陸續實施的結果，所謂「戰時經濟體制」更加周密，更加強化。此外如外匯管理法，電力國家管理法，職業紹介所國營法，肥料分配法等，皆爲此而制定的。現時他們政府對於任何部門的生產事業，皆有統制的權力，不但生產如是，消費也是如此。甚至或部門的分配，也由政府加以統制。從全局看來，敵人的經濟制度，已由自由競爭的經濟，進入國家統制經濟的階段了。

(七)日本戰費來源的窮困

日本是窮困的國家，戰爭開始以前，因爲擴張軍備，每年財政總是依賴公債來彌補的。這種公債，他們稱爲「赤字公債」。他們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，常常警告軍閥，國家財

力負不起這麼大的軍備。公債如達到一百萬萬日元，就要亡國。在五一五事件以前的內閣，差不多都是因為這問題，引起內閣與軍部的摩擦。但是軍部的壓力過大，而且時勢的潮流，不易反抗的，經過了許多事變之後，穩健的政治家也不能不退讓了。軍部發動了九一八事件，造成任何政治家都不能不接受他們主張的局面。所以他們從九一八事變的翌年，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起，每年的總預算突然增加了。

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）歲出總數十九萬萬五千零十四萬日元

昭和八年（一九三三）歲出總數二十二萬萬五千四百六十六萬日元

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歲出總數二十一萬萬六千三百零二千日元

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歲出總數二十二萬萬零六百四十七萬七千日元

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歲出總數二十三萬萬一千七百七十二萬四千日元

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歲出總數二十八萬萬七千二百十三萬五千日元

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歲出總數二十八萬萬六千八百萬日元

這與昭和六年（一九三一）的歲出，比較起來，便覺可驚，昭和六年僅十四萬萬七千

六百八十七萬五千日元。明年度的普通預算（日本會計年度每年自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卅一日止爲一年度），又達三十六萬萬日元以上。這種加速度的增加，是敵人的國力所不能負擔的。敵人對我的戰費，皆在普通預算以外。七七事變發生，他們立從第二預備金中（日本預算皆列有預備金一項，以備預算外臨時支出之用）提出一千零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日元，作爲臨時的出兵費用。是年七月二十二日適第七十一屆議會開會，又提出所謂「華北事變費」，一般會計九千六百八十萬九千日元，特別會計二十一萬五千日元，皆以公債爲財源的。七月底他們決定擴大軍事行動，在上海方面挑戰，於八月初，又在同一議會中，提出第二次所謂「華北事變費」追加預算，一般會計四萬萬一千九百六十三萬五千日元，特別會計三百一十一萬七千日元。其中三萬萬一千萬日元，是依賴公債的，一萬萬日元新辦「華北事件特別稅」來補充的。八月十三日上海事變發生後，我國堅強抵抗，他們又痛感戰事非短期可了，於是於八月十七日開議，決定召集臨時議會，即第七十二屆議會。九月四日開會，一舉而提出「中國事變費」（他們將「華北事變」改稱「中國事變」），二十萬萬二千二百七十萬日元的巨大戰費，全部以公債爲財源。並且這預算是由昭和十二

年九月至十三年一月底爲止的。三項所通過的戰費，共計二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三日元，而使用的期間，是從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至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一月爲止，其中二十三萬三千二百七十萬日元，是發行公債的。

我們從戰爭初期中，敵人三次增加戰費預算的步驟看來，便可以斷定敵人逐步實現預定計劃的陰謀。他們在八月七日通過了四萬萬三千二百餘萬的戰費，而八月十七日又決定召集臨時議會，提出二十萬萬餘的戰費，相差不過十日。他們所以分作三次提出的原因，不外希圖掩飾而已。但是從步驟，期間，數額看來，正所謂「欲蓋彌彰」了。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於九月八日閉會後，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七十三屆普通議會又開會了。他們在這次議會中，又提出第四次「中國事變費」四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的驚人的戰費，除了三萬萬日元（內一萬萬日元是繼續以前的），是創辦「中國事變特別稅」來補充的，一萬萬日元，是由官營事業利益中撥用的，其餘四十四萬萬五千萬日元，全部依賴公債的。前後四次的戰費，自開戰到今年三月卅一日止，共用戰費七十四萬萬零二百六十六萬二千二百二十三日元，其中六十七萬萬八千二百七十萬日元，是發行公債彌補的。今年四月一日至明

年三月卅一日止，對我戰費，業經議會通過，預算額是四十六萬萬五千萬日元，其中四十二萬萬日元，又是發行公債的。從過去敵人對外作戰的歷史看來，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役，共用戰費二萬萬五千萬日元，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役，共用戰費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，一九一四年的日德戰役，共用戰費三萬萬五千萬日元。若以這三次戰爭與這次戰爭比較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據說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役，每兵每日所需僅八角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，每兵每日所需約二元四角，一九一四年日德戰役，每兵每日所需約三元二角。現在據專家估計，因物價騰貴與軍器發達的結果，每兵每日所需約十七元五角左右，所有糧食，子彈，軍火，消耗，運輸，宣傳等等費用，包括在內。比日德戰役增加五倍半，比日俄戰役增加八倍弱，比中日戰役增加十一倍。敵人現時每日所用戰費，約一千二百萬日元左右，而每日所發行的公債，也與此相等。就這趨勢看來，其不能支持，明甚。

（八）日本國民負擔力的薄弱

我們要檢討敵人的負擔力，究竟如何？敵人每年國民總所得不過一百二十萬萬日元左右，一百三十萬萬日元左右，其中除了消費以外，實際可以儲蓄成爲資本的，只有二十萬萬日

元至三十萬萬日元左右。這就是每年所能負擔的力量。開戰以來，敵國政府極力提倡節約，務須盡量減少消費，盡量增加儲蓄，所以過去十幾個月中，頗有效果，各銀行的存款與郵政儲金都增加了，可是存款增加的速度，沒有戰費增加速度快，還有許多應發未發的公債約二十餘萬萬日元，存在財政部的庫中。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。開戰以後，他們財政當局所苦心計劃的，就是推銷公債問題。他們的戰費，十分之九以上，是靠公債的，公債如不能推銷，戰費就無從籌措。最近四年敵人公債總數，大體如左：

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九十五萬萬八千零八十九萬一千日元

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一百零三萬萬九千五百二十萬零六千日元

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一百十八萬萬九千二百九十四萬九千日元

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一百六十二萬萬三千三百四十四萬九千日元

昨年一年公債增加的速度，真是空前未有的。昨年所發行的公債，達四十三萬萬四千零五十萬日元之巨，而昨年預算上應當發行的公債，約五十一萬萬六千七百二十萬日元，因為市面不能承銷，只發行了百分之八十四，並且四十三萬萬四千零五十萬日元公債之中

，真由國民直接購買的，不過四萬萬六千二百萬日元，約佔百分之十，其餘百分之七十五，是用種種方法，由金融機關，各種工商業公司，郵政儲金局承銷的，尙有百分之十五，只得由日本銀行充作發行紙幣的保證準備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惡性通貨膨脹的因素。我們從這個數字看來，就可以推測敵國國民每年自動購買公債，不過五萬萬日元左右，而每年應發行的公債，總在五十萬萬日元上下，其中有三十萬萬日元，非用特殊方法，強迫各銀行，各信託公司，各保險業，各大公司承銷不可的，其餘則爲日本銀行增發紙幣的保證準備。所以戰事期間越長，公債發行越多，日本銀行的紙幣，發行也越多，通貨膨脹的性質，也越變越惡化。這是敵人經濟的致命傷。現在公債發行的趨勢；至本年年底，必然要達二百萬萬日元的數字，每年週息平均以四厘計算，僅付利息，就要八萬萬日元，財政還不至破產麼？從前他們財政權威高橋是清說過：「百億公債，即可亡國」，現時即將超過一倍，其何以堪！

（九）通貨膨脹的惡性化

我們要研究敵人通貨膨脹的趨勢，必須先研究戰前的通貨狀態。因爲戰費公債，幾乎

全部由日本銀行承受，再由該行轉售與各銀行各公司，如賣不出去，則由日本銀行充作保證準備，發行紙幣，所以公債與通貨膨脹，有連帶的關係。試舉最近六年日本銀行紙幣最高發行額如左：

- 昭和八年（一九三三）十五萬萬四千四百八十萬日元
- 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十六萬萬二千七百三十萬日元
- 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十七萬萬六千六百六十萬日元
- 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十八萬萬六千五百七十萬日元
- 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二十三萬萬零五百十萬日元
- 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二十七萬五千五百萬日元

我們從這簡單的統計看來，就知道戰費公債通貨膨脹的關係，如何密切了。在一九三六年，日本銀行紙幣最高發行額，不過十八萬萬六千六百六十萬日元，到了一九三七年，便增加到二十三萬零五百十萬日元，一年之中增加了四萬萬三千八百五十萬日元。一九三八年又比一九三七年增加四萬萬四千九百九十萬日元。兩年之間，增加了八萬萬八千八百

四十萬日元，豈不驚人！通貨如此澎漲，物價怎能不漲！日本銀行紙幣的保證準備發行額，本來只有十七萬萬日元，後來增加到二十二萬萬日元，現在又增加到二十七萬萬日元。現金準備發行額，只有五萬萬日元。日本銀行的紙幣，擬與朝鮮台灣兩銀行作發行紙幣的基金，共計約有三萬萬五千九百六十萬日元。日本銀行紙幣本來是不兌現的，而朝鮮台灣兩銀行的紙幣，更是不兌現的。近來敵人又把日本銀行的紙幣，在票上畫了兩條紅線，畫了「軍用票」三字戳印，運到上海使用，真是陰險極了。同時在北平偽組織之下，設立偽「聯合準備銀行」，發行偽鈔。而偽鈔的基金，是用朝鮮銀行紙幣充數的，等於把日本銀行不兌現紙幣，推行到平津濟青各地去。我們預料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，到今年底，必定要達二十三萬萬日元左右，物價也必定隨着加速度的騰貴，國民生活要受更嚴重的威脅。昭和十二年（一九三七）東京零售物價比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騰貴百分之十二。二，而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又比昭和十二年騰貴了百分之十六。二，是兩年之中，騰貴了百分之二十八。四。今年的趨勢，可想而知。這就是敵人金融的危機。

（十）農村問題與農民的窮困

日本本來是農業的國家，明治維新以後，經過五十年艱努力，才轉變為輕工業的國家，但是農業仍佔重要的地位。我們就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的三年間的統計看來，便可以明白的。

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三十一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

工業生產價額九十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元

農業生產價額二十三萬萬九千三百萬元

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一百萬日元

工業生產價額一百萬萬零八萬三千七百萬元

農業生產總價額二十八萬萬二千八百萬元

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全國生產總價額一百七十二萬萬三千五百萬日元

工業生產總價額一百二十二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

農業生產價額三十二萬萬五千七百萬元

由這些數字，可以看出農業生產價額，大體上佔生產總價額六分之一。敵人全人口七

千萬之中，農民一千五百萬左右，佔五分之一弱，地位重要，不言而喻。但是農民的負擔特別重，據他們專家估計，農民每年須收入十分之一乃至一點五，是負擔各種租稅的。農產物的價格，有日趨低落的傾向，肥料的價格，又有逐年騰貴的趨勢，所以農民的收入，無論從絕對價值說，或從相對價值說，皆已降低。據他們調查，全國農民負債總數，達五十萬萬日元之多。平均每一農民負債約三百三十三元。敵人全國之中，尤其以東北六縣，農村狀況為最壞。外國人要到東北旅行，他們一定拒絕的。昭和五年（一九三〇），國務總理大臣濱口雄幸被刺事件發生以後，破獲血盟團秘密組織，發覺他們的動機，皆由農村貧困而來，於是農村救濟問題，始為為政者所重視。但是各種救濟方策，皆不澈底。並且來自田間的士兵與軍官，對於現在社會機構，益形不滿。反對資本公司，打倒資本主義的呼聲，遍於全國農村。所以數年之間，由這類秘密團體所發動的暗殺事件，層出不窮。右派團體以及青年軍官所迫切期待解決的，只有農村問題。五一五事件以後，漸進的右派軍人所要求內閣解決的，也是農村問題。但是自齋藤內閣至近衛內閣，始終對這嚴重的問題，並無切實有效的救濟方案。戰事發生以後，農村問題更形惡化，因為徵召的兵士，多係農

村子弟，農村勞力，大感缺乏，生齒力當然減少，並且徵發馬匹與糧食，數量甚大，所以農村與軍需工業，正成相反的對照。戰爭越久，農村越衰落。假使無合理的救濟方法，難保不引起農民的暴動。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大問題。

(十一) 日本社會的奇怪現象

敵人在科學方面，經五十年的努力，不能不謂有相當的進步，尤其在醫學方面，頗有可觀。但敵人民族性，有特別奇異之點，即迷信神道，非常普遍，而且根深蒂固。敵人本來受印度的影響，信奉佛教，幾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。但於佛教之外，又信奉各種邪教，故這類神祕的團體及莫明其妙的宗教，遍地皆有。如神道教，大本教，人道教等，皆為驚動一時的邪教事件。這類邪教，多則有信徒二三百萬人，少亦數十萬人。教主從信徒禱取獻金，養尊處優，幾等帝皇。建築廟宇，動費數百萬元。每因教主利用信徒的迷信心理，實行奸淫行爲，致被破獲。最可怪者，信徒並非愚夫愚婦，有許多是達官顯宦，和智識分子，真是不可思議。敵人每一家庭皆供奉神佛，每日膜拜，必恭必敬。甚至汽車司機人，也必請神符，懸掛車上，求免災難。從軍的軍人每人身上，也帶神符，祈願安全。這次

我們在各戰場所俘獲的敵人官兵及屍體，都發見這種神祕的東西。我們所擊落的敵人飛機，及所俘獲的空軍官兵，也有同樣的發見。神佛在敵國的威力，如何偉大，可想而知。所以他們如此迷信，即他們學者也沒有正確的解答。

敵國自殺風氣，非常厲害，尤以情死風氣，最為普遍。我們僅就他們報紙所報道的事件而觀，至少可以說每天有三四件。報紙所未報道的，尙不知若干。自殺的風氣，是不足為訓的。人生目的要前進的，要奮鬥的，遭遇任何困苦艱難，都要想法克服的，自殺便是退却，便是卑怯，情死更不足道。敵國習慣，結婚離婚是比較自由的，何以情死如此之多，真不可解。至於情死方法，跳山的，跳水的，臥鐵軌的，服毒藥的，都有。敵人所引為榮譽的「切腹」死法，近來却不多見了。因為現代的日本人，已不如以前的勇敢了。當武士最愛社會崇拜的時代，「切腹」的死法，最為社會所樂道。以武士自命的人們，也以這種死法，為最榮譽。從這一點，也可以看出敵人心理與信念的變遷。

敵人素以廉潔政治自稱，其實達官顯官貪污的事實，並不少見。明治年間的西門子事件，海軍重要將領受賄，引起了大政潮。大正年間，陸軍重要將領受賄事件，也有許多要

人下獄。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帝國人造絲公司事件，兩位前任大臣，財政部次官司長，及台灣銀行經理等十六人犯受賄嫌疑下獄，致齋藤內閣因此瓦解，這是最近的貪污大事件。此外如一個縣政府會計課長，可以侵吞公款至數十萬元之多，真是驚人的怪事。貪污的原因，當然甚多，敵人在歐戰時，不但沒有受戰爭的損害，而且發了許多戰爭的暴財，社會風俗，自此以後，日趨奢侈，一飯千金，並非意外事。至今我們在敵人國內，隨處可以看見華麗的飯館和咖啡館，只就東京一處而言，每日消費在這些娛樂場所的金錢，總在三十萬元左右。更奇怪的，最近十年，打麻雀的風氣，非常之盛，到處却有麻雀俱樂部。表面雖然不賭錢，事實上暗中仍有金錢的輸贏。這是敵人國民性墮落的一個表現。

敵人前後四次戰爭，都是在國外作戰，所以他們除了當兵以外，沒有認識戰爭的恐懼。兩年的日俄戰爭，死亡雖然慘重，但是他們生活上還沒有感覺重大的壓迫。這次對我作戰，規模之大，遠非日俄戰爭所可比，而物資的統制，更非彼時夢想所可及。現在不獨奢侈品是不易得的，即生活上必需品，也有嚴密的限制。如毛織物，除了軍隊以外，是不許用的。棉織物，因棉花進口限定數量，也不能購買了。皮革之類，是專供軍隊使用的，連

皮鞋都買不着了。要縫新洋服，必須交出舊洋服作交換的。五金類也除了軍用以外，都用替代品了。今年物資的統制，必然更加嚴密。物資的缺乏，也必然更加深刻。我們在這次戰爭，必須給與敵人以前絕後的嚴重教訓，才能喚醒他們征服中國，征服亞洲，征服全世界的迷夢！

——完——

最
精
研
究

578

(Z)

ABC
3
731.30
D